·综　述·

家庭伤害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影响

刘思佳[1,2]，黄垂灿[2]，樊利春[1,2]

1. 海南医学院，海南 海口　571199；2.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海南 海口　570206

摘　要： 家庭是儿童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家庭伤害是家庭因素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目前已成为危害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严重公共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迄今为止，国内尚缺乏家庭伤害与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之间关系的综合论述。本文从家庭伤害相关理论、主要内容及其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总结回顾，探讨家庭伤害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影响，旨在提高我国学者对家庭伤害的认识，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关键词： 家庭；伤害；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社会适应能力发展

中图分类号：R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79(2024)07-0757-05　doi:10.11852/zgetbjzz2023-0916

Impact of family har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arly mental cognition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LIU Sijia[1,2], HUANG Chuican[2], FAN Lichun[1,2]

1.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99,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ld Health Care, Hainan Women and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Haikou, Hainan 570206,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 Lichun, E-mail: flc007@hainmc.edu.cn

Abstract: Family serves as the primary context for a child′s daily life, with family harm emerging a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fluencing early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and adoleacents. This issue has become a serious public concern due to its potential to jeopardize the holistic well-being of children, garnering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globally. Despite this, there remains a gap in the domestic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family harm with the developmental aspects of early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abilities in children. The article provides a summary and review of the theories, main content, and impact on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adap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regarding family harm, aiming to enhance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family harm in our country and collectively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Keywords: family; harm; children;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social adaptability development

家庭环境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环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经常被忽视的伤害环境，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有着最直接的影响[1]。近年来家庭伤害的发生率逐渐增高，据 2018 年我国伤害监测系统报道，家庭伤害比例高达 65.7%[2]。2020 年中国死因监测报告指出伤害是中国 1～4 岁儿童(50.88%)和 5～14 岁(48.43%)青少年的主要死因，也是 1 岁以下儿童的第三大死因(8.64%)[3]。伤害已经演变为对儿童青少年身体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公共卫生问题。

儿童青少年家庭伤害通常指的是在家庭环境中对儿童青少年身体、心理健康造成的伤害[4-5]。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报告指出，家庭伤害分为显性伤害和隐性伤害两种，显性伤害主要包括家庭暴力和触电、溺水等意外伤害；隐性伤害指由于家庭环境造成的伤害，包括物质环境造成的儿童人身的伤害(家居装修、家庭居住环境条件脏乱差等)和家庭非物质环境造成的伤害，如父母不良嗜好、教养方式不当、父母离异或者角色缺失造成的儿童人身潜在的伤害[6]。近年来，随着各类家庭伤害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报道，但这一方向尚未有相关的综合论述。本文

基金项目：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ZDYF2020210)；海南省临床医学中心建设项目(琼卫医函[2021]75 号)；海南省优秀人才团队资助(琼人才办通(2021]21 号)；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Na 821QN416)

作者简介：刘思佳(1994-)，女，住院医师，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儿童保健。

通信作者：樊利春，E-mail：flc007@hainmc.edu.cn

通过对各类家庭伤害进行阐述，并从伤害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影响进行总结回顾，旨在说明家庭伤害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影响。

1 家庭伤害的分类

1.1 家庭意外伤害 家庭既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塑造健康意识和习惯的关键环境，同时也可能成为导致伤害发生的关键场所之一。家庭伤害最常见的类型是家庭意外伤害，常指儿童青少年在家庭环境中身体受到来自外界、突然发生、非故意、非预期、非疾病造成的致命或非致命伤害[7]。非致命性伤害是指过去 1 年内，因意外伤害影响日常活动或导致缺课但无生命危险的伤害[8]。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最常见发生地点是家里，其次为学校、公共场所等。家庭意外伤害发生的原因主要与儿童家庭情况、照护者看护情况、意外伤害发生情况及紧急救治情况等有关，同时与儿童天性活泼好动、机体运动器官发育尚不成熟，对外界危险因素识别、运动损伤防范知识的缺乏有关[9]。父母和照护者可以通过创造安全的环境、密切监督儿童以及对潜在危险或事故迅速作出反应来预防这些伤害。

1.2 家庭虐待 儿童青少年家庭虐待是指在家庭环境中，由父母、监护人等家庭成员对其造成身体、情感或性等方面的故意伤害行为，包括躯体虐待、躯体忽视、情感忽视和性虐待 4 种虐待类型，可以单一出现也可以交叉发生[10]。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数据报告指出，每年有 10 亿儿童在遭受某种形式的虐待，近 3/4 的 2～4 岁儿童经常遭受父母和照料者的体罚和/或心理暴力[11]。美国儿科学会曾指出儿童遭受虐待和忽视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因素和儿童自身因素两方面[12]。在中国，因传统思想的影响，父母及老师对儿童的教育存在一定的错误认知，教育子女的方式过于极端化，且家庭关系紊乱、父母自身心理健康问题和法律意识的缺乏均会导致儿童青少年家庭虐待的发生。一项系统综述报道，在中国，儿童身体和情感虐待的发生率约为 20%～30%，约 12%的儿童曾遭受过性虐待，在这些虐待形式中，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的发生率最高[13]。儿童青少年虐待是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且存在高度隐蔽性，如何准确识别及阻止儿童青少年所遭受的虐待、保障其身心健康，对促进儿童青少年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3 家庭隐性伤害 相对于明显的家庭意外伤害或虐待等显性伤害，家庭不良养育环境伤害表现得更为隐蔽，通常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不易被他人察觉，往往被忽视或被误解为正常的家庭困扰[14]。儿童青少年可能会因此导致抑郁、焦虑和愤怒等情感问题和社交困难、学习问题和行为问题等，对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1.3.1 父母不良社会行为 众多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父母一方或双方有不良嗜好及情绪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外化行为、内化症状和心理健康问题，问题行为的存在不仅会阻碍儿童青少年生理和心理认知的发展，严重的还会危害到其以后的学习、生活及未来社会适应能力发展[15]。父母情绪问题及不良嗜好的出现与其文化程度水平息息相关，过早地脱离学校，会增加抽烟、酗酒、物质滥用等不良嗜好的出现几率[16]。参与赌博、酗酒和滥用物质将明显增加虐待儿童青少年的危险性，高知父母能给儿童青少年带来良好的物质基础、温馨的家庭关系和较好的家庭养育环境，更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17]。

1.3.2 不良的家庭结构模式 一项关于家庭结构变化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系统回顾指出，父母离婚或分居引起的不良养育环境会给儿童成长造成了长期的伤害[18]。根据 2021 年民政部门的登记数据，2017—2020 年我国离婚率波动在 3.1‰～3.4‰，离异家庭儿童开始成为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群体，全国范围内的离婚登记人数达到了 214.1万对，除此之外，法院判决和调解的离婚案件数量也达到了 69.8 万对[19]。《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和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每 3 名城镇儿童中就有 1 名流动儿童，每 10 名农村儿童就有近 4 名是留守儿童，全国有 1.08 亿儿童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和父母双方一起居住[20]。与由父母监护的儿童相比，长期由祖辈或亲戚抚养的留守儿童因存在着缺少沟通等处境不利因素，往往面临更多的儿童期创伤，长大后更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21]。

1.3.3 家庭社会经济剥夺 澳大利亚学者 Osborne 等[22]研究发现，社会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的儿童家庭伤害发生率更高。儿童家庭社会经济条件与其养育环境关系密切，高收入父母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能通过更多的途径和渠道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营造良好的养育环境[23]。在儿童青少年成长和发展资源显著缺乏的家庭中，不良的饮食条件和医疗资源相对匮乏使儿童青少年可能面临缺乏足够的营养和健康保障的风险，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和社交技能的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24]。不洁的家庭居住环境可能增加儿童感染性疾病及传染性疾病的风

险，加大家庭医疗支出，导致家庭和社区教育资源缺乏，无法为儿童青少年提供适宜的刺激环境，恶劣的居住环境不利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25]。

1.3.4　家庭教养方式不当　教养方式是指家长在抚养和教育子女过程中对儿童青少年的养育方式和教育方法，包括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三种不同类型[26]。家庭教养方式是影响儿童青少年自尊、亲社会发展方向、速度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专制型和溺爱教养方式可能使儿童青少年产生焦虑或抑郁等不良的情绪反应，变得以自我中心、缺乏自制力和责任感，对他们的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信任鼓励、情感温暖的家庭教养方式能加强亲子互动，进而能促进儿童亲社会情感能力、自信心的发展[27-28]。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促进儿童语言、认知、运动和心理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有效增加儿童学习的机会，提供良好的回应性照护[29]。

2　家庭伤害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发展的影响

儿童早期是心理认知快速发展时期，研究表明，生命早期经历与儿童早期的心理认知健康问题相关，可以迁延至青少年期甚至成年期，影响整个生命周期[30]。儿童家庭伤害作为一种童年期创伤性压力事件对儿童青少年个体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童年时期的家庭伤害、家庭精神疾病和物质滥用是儿童和青少年甚至成年后产生不良心理健康结果的主要危险因素，会导致各种心理认知行为问题的出现，如抑郁、酗酒、焦虑和自杀行为等[31]。儿童青少年在认知水平和情感态度等方面的成熟程度具有局限性，极易受家庭等外部因素影响，心理创伤还有可能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得以延续，使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受害者成为成年时期的施害者[32]。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常见心理影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经历创伤的儿童会出现情绪失控、行为异常、注意力不集中等表现，影响睡眠的同时会影响其正常的生长发育[33]。父母离婚或分居的儿童及留守儿童作为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缺乏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常会出现性格缺陷、心理失衡、逆反心理严重、自律性差等问题，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34]。家庭暴力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儿童在早期阶段经历极度的焦虑和恐惧，使其难以适当地处理自己的情感，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35]。

经历过家庭伤害的儿童青少年更可能出现身心健康问题，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以防止童年逆境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行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36]。家庭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创伤的源头，也是疗愈创伤的起点，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发展的保护因素之一，对儿童青少年心理素质起正向调节作用[37]。良好的亲子交流需要加强和儿童青少年的有效沟通，关心其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给予精神上的关心和支持，可以有效减少负面事件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38]。

3　家庭伤害对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影响

社会适应能力是指在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能积极进行心理和行为上的调整，以实现与社会环境协调和平衡的能力[39]。社会适应良好的典型表现是亲社会行为，常在社交互动中表现出的积极和有益的社会适应能力。赵纤等[40]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父母教养方式的异质性对儿童青少年早期亲社会行为发展轨迹存在显著效应，适度关爱型父母教养方式可以缓冲贫困家庭中女童亲社会行为的下降速度。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亲社会行为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开始与他人进行互动，建立社会关系，学习社会技能，并形成他们的认知和情感发展的基础[41]。目前许多儿童青少年受到现代原生家庭过分溺爱的影响，导致其社会适应水平普遍较低，在与他人相处时，容易展现出偏激行为和孤僻情绪。研究表明，父母在家庭整体环境中展示良好的互动关系，积极回应他人的需求，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发展[42]。青少年共病调查组织的数据分析研究发现童年期逆境与儿童青少年智力下降存在相关性，且患抑郁症及重度抑郁症的几率明显增高[43]。儿童青少年在与亲人或家庭环境分离后，常常会产生分离性焦虑，表现为害怕、担心等情绪及行为反应，可能会出现孤独谱系障碍前期表现，学龄期儿童可能会出现拒绝上学、拒绝独自就寝等不良情绪[44]。

家庭伤害对儿童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还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如儿童青少年的年龄、伤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其他家庭成员或照护者提供的支持和护理水平，以及儿童的性格等。家庭居住环境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发展和身心健康呈正相关，并具有良好的中介效应。家庭良好的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能促使儿童青少年表现出积极行为，并且抑制儿童青少年的违纪行为和攻击行为，儿童青少年在良好的亲子互动中能够培养更多的亲社会行

为，并展现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家长、照顾者和相关专业人士认识到家庭伤害对儿童青少年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提供适当的支持和干预是非常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伤害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重要内容之一，家庭因素与儿童伤害行为关系密切，关注并改善家庭伤害对儿童青少年心理认知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工作十分重要。目前国内外各种家庭伤害问题严重，仍未得到足够重视，家长们对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知识和安全急救知识掌握度普遍低下，通过提供伤害预防咨询服务和健全家庭防范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家庭伤害的发生。同时，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和健康教育也能够显著提高个体的预防意识和行为，从而有效降低家庭伤害的发生。减少儿童青少年家庭伤害不仅需要照护者的努力，更需要家庭、社会、政府的多方面合作，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Gertler P, Heckman J, Pinto R, et al. Labor market returns to an early childhood stimulation intervention in Jamaica[J]. Science, 2014, 344(6187): 998-1001.

[2] 耳玉亮，陆治名，汪媛，等. 中国 2018 年伤害监测系统 0～5 岁儿童伤害病例特征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2020，41(7)：971-975.
Er YL, Lu ZM, Wang Y, et a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jury among children aged 0-5 years: Results from Chinese National injury Surveillance System in 2018[J]. Chin J Sch Health, 2020, 41(7): 971-975. (in Chinese)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 中国死因监测数据集 2020[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
China CDC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Statistics Information Center. (2021). China Mortality Surveillance Data Set 2020 [M]. Beijing: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in Chinese)

[4] Park EJ. Textbook of preventive and social medicine[J]. Revista De Saude Publica, 2013: 355-356.

[5] Finkelhor D, Turner HA, Shattuck A, et al. Violence, crime, and abuse exposure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children and youth: An update[J]. JAMA Pediatr, 2013, 167(7): 614-621.

[6] 劳凯声，孙云晓. 新焦点-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J]. 人民教育，2003，54(11)：46.
Lao KS, Sun YX. New focus: Research report on personal injury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 People's Education, 2003, 54(11): 46. (in Chinese)

[7] Borse N, Sleet DA. CDC childhood injury report: Patterns of unintentional injuries among 0-to 19-year 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2006 [J]. Fam Community Health, 2009, 32(2): 189.

[8] ALBashtawy M, Al-Awamreh K, Gharaibeh H, et al. Epidemiology of nonfatal injuries among school children[J]. J Sch Nurs, 2016, 32(5): 329-336.

[9] 刘红林，徐鸣浩，侯瑶. 昆明地区儿童意外伤害 3086 例调查分析[J].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19，40(9)：41-45.
Liu HL, XU MH, Hou 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unintentional injuries among 3086 children in Kunming area[J]. J Kunming Med Univ, 2019, 40(9): 41-45. (in Chinese)

[10] 郭乐，邱家俐，陶蕾，等.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儿童家庭虐待问题的政策探析[J]. 早期教育，2021(51)：16-20.
Guo L, Qiu Jl, Tao L, et al. Policy analysis on child family ab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ource theory[J]. Early Education, 2021(51): 16-20. (in Chinese)

[11] Organization WH.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preventing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EB/OL]. (2020-06-18)[2023-09-06].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 un. org/zh/node/3608.

[12] Flaherty E, Stirling J. Clinical report-the pediatrician's role in child maltreatment prevention[J]. Pediatrics, 2010, 126(4): 833-841.

[13] Wang L, Cheng H, Qu Y,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child maltreatment among Chines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Soc Psych Psych Epid, 2020, 55(9): 1105-1119.

[14] 沈东华. 学生隐性伤害的现状分析[J]. 教学与管理，2014，31(9)：94-96.
Shen Dh. 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of students'hidden injury[J]. Teach. Manag, 2014, 31(9): 94-96. (in Chinese)

[15] Balalian AA, Graeve R, Richter M, et al. Prenatal exposure to opioids and neurodevelopment in infancy and childhood: A systematic review [J]. Frontiers in Pediatrics, 2023, 11: 1071889.

[16] Lui C, Witbrodt J, Li L,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behavioral, substance use, and academic outcomes in childhood through adolescence in a U. S. longitudinal cohort[J]. Drug Alcohol Depend, 2023, 244: 109795.

[17] Francis A, Pai M, Badagabettu 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among adolescents[J]. Compr Child Adolesc Nurs, 2021, 44(2): 134-143.

[18] Moor N, Komter A. The impact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disrup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exchange in Eastern Europe[J]. Eur J Ageing, 2012, 9(2): 155-167.

[19] 国家民政办公厅. 2021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www. mca. gov. cn/images3/www2017/file/202208/2021mz-syfztjgb. pdf. (2022-08-26)[2023. 01. 25].

[20]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 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R]. 2023.

[21] 范兴华，简晶萍，陈锋菊，等. 家庭处境不利与留守儿童心理适应：心理资本的中介[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26(2)：353-357.
Fan XH, Jian JP, Chen FJ, et al. Family adversity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mong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J]. Chin J Clin Psychol, 2018, 26(2): 353-357. (in Chinese)

[22] Osborne JM, Davey TM, Spinks AB, et al. Child injury: Does home matter? [J]. Soc Sci Med, 2016, 153: 250-257.

[23] Ming H, Zhang F, Jiang Y, et al.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

tus and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arental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ren's subjective social mobility[J]. Br J Psychol, 2021, 112(3): 720-740.

[24] Ho L, Li W, Cheung AT, et al. Impact of poverty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arental stress,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2, 10: 849408.

[25] 成晓芬，胡依，郭芮绮，等. 居住环境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及社会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教育，2023，39(2)：99-105.
Cheng XF, Hu Y, Guo RQ, et al. The impact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adolescent health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social adaptation[J]. Chin J Health Educ, 2019, 39(2): 99-105. (in Chinese)

[26] 田婧. 家庭教养方式与幼儿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3，39(7)：84-94.
Tian J. Study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mental health[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23, 39(7): 84-94. (in Chinese)

[27] Soenens B, Vansteenkiste M, Luyckx K, et al.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An integrated model with adolescent self-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parental knowledge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J]. Dev Psychol, 2006, 42(2): 305-318.

[28] Xu J, Zhang H. Parenting and chinese adolescents' multidimensional prosocial behavio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ympathy[J]. J Psychol, 2023, 157(6): 389-408.

[29] Rocha N, Dos SSF, Dos SM, et al. Impact of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life: A systematic review[J]. J Child Health Care, 2020, 24(3): 365-385.

[30] Straatmann VS, Lai E, Lange T, et al. How do early-life factors explain social inequalities i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Findings from the UK Millennium Cohort Study[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19, 73(11): 1049-1060.

[31] Felitti VJ, Anda RF, Nordenberg D, et al. REPRINT OF: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J]. Am J Prev Med, 2019, 56(6): 774-786.

[32] Farina A, Kremer K, Maynard B, et al.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among families in El Salvador: An exploratory study[J]. J Child Adolesc Trauma, 2020, 13(4): 515-525.

[33] Kilpatrick D, Ruggiero K, Acierno R, et al. Violence and risk of PTSD, major depression, substance abuse/dependence, and comorbidity: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adolescents[J].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3, 71(4): 692-700.

[34] 王晓会.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现状与干预策略研究[J]. 天津教育，2021，72(16)：185-186.
Wang Xh.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J]. Tianjin Educ J, 2021, 72(16): 185-186. (in Chinese)

[35] Alhalal E, Binomran K, Al-Radwan Z, et 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chool-age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Unpacking the effects of family functioning, mothers'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capital[J]. Issues Mental Health Nurs, 2023, 44(11): 1109-1118.

[36] Mclaughlin K, Sheridan M. Beyond cumulative risk: A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childhood adversity[J]. Curr Dir Psychol Sci, 2016, 25(4): 239-245.

[37] Zhang T, Wang Z. The effects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logical suzhi between school climate and problem behaviors[J]. Front Psychol, 2020, 11: 212.

[38] Anderson K, Rueter M, Connor J, et al. Parental conformity expectations' effect on twins' and singletons'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ssociations with change in adjustment from middle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J]. J Res Adolesc, 2019, 29(4): 832-845.

[39] 逯小龙，王坤. 课外体能锻炼对大学生心理资本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J]. 中国学校卫生，2019，40(3)：392-395.
Lu XL, Wang K. Influence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J]. Chin J Sch Health, 2019, 40(3): 392-395. (in Chinese)

[40] 赵纡，王志航，王东方，等. 贫困家庭儿童在青少年早期的亲社会行为发展轨迹：性别及父母教养方式异质性的影响[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39(3)：323-332.
Zhao X, Wang ZH, Wang DF, et al.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prosocial behavior in lmpoverished children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parenting style heterogeneity[J]. psychol Dev Edu, 2019, 39(3): 323-332. (in Chinese)

[41] Malti T, Dys SP. From being nice to being kind: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s[J]. Curr Opin Psychol, 2018, 20: 45-49.

[42] Scrimgeour M, Blandon A, Stifter C, et al. Cooperative coparenting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J]. J Fam Psychol, 2013, 27(3): 506-511.

[43] Platt JM, McLaughlin KA, Luedtke AR, et al. Targeted esti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fluid intelligence in a US population sample of adolescents [J]. Am J Epidemiol, 2018, 187(7): 1456-1466.

[44] 张丽丽，王琳. 儿童焦虑的认识、预防与应对策略[J].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2022，37(11)：808-812.
Zhang LL, Wang L. Recognition, preven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anxiety in children[J]. Chin J Pract Pediatr, 202, 37(11): 808-812. (in Chinese)

收稿日期：2023-09-06　**修回日期**：2024-03-10　**本文编辑**：杨媛媛